

南洋華人对孫中山先生反滿革命
运动的贡献及其与香港的联系

新華書店

PDG

九、南洋華人對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運動的貢獻 及其與香港的聯繫

孫中山先生爲我國近代偉人，首倡綜合中外、融貫古今的國民主義，領導志士推翻滿清，結束了我國數千年根深蒂固的專制政體，建立了全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其第一階段反滿革命之有組織的行動，雖開始自甲午（一八九四）十月成立興中會於檀香山，但其前期革命行動的中心，則在香港；及一九〇五年八月第一次反滿革命黨人大團結所組織的中國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領導中心顯然已移至日本東京，而且隨著大批留日學生的加入團體，反滿革命在實力與境界上都因而大爲充實，爲此後的成功奠定基礎。惟因日本在滿清政府的壓力下，對於反滿革命採取日益敵視的態度，一九〇七年三月，孫中山甚至被迫離日南下，其密切追隨參贊革命的一批志士如黃興、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張繼、居正等，亦大都先後隨之離開東京，陸續集中於新加坡、馬來亞等南洋地區，一時南洋在反滿革命的地位上，大爲提高，已與香港具於同樣領導的地位。這種情形，至一九〇八年秋同盟會南洋總支部在新加坡成立後，南洋在整個革命指揮的地位上，甚至已超過香港，而成爲實際指揮全盤反滿革命的中樞。這主要由於孫中山本人在該年三月底移居新加坡，親自參與該總支部的創立，其後陸續逗留該市達八個月，孫氏家眷亦一度被安排居住於檳城（

Penang，檳榔嶼）柑仔園四〇四號達半年之久（註一）。由於南洋地區擁有數百萬之衆的華人社會，而華人中的絕大部分在當時都是熱心改圖情勢的人，加之他們之中的大部分都隻身移居南洋，身受各類不同性質的刺激與痛苦，其愛國愛鄉之心，常較之國內人士更為堅強激烈，為支助中國革命提供一巨大泉源。另外由於當地各殖民政府對於反滿革命黨人常持中立性的友好態度，對於孫中山反滿革命事業的推動，亦提供一極為有利的條件。所以，不只所有辛亥革命前所發動的十次武裝起義中，有四次係以越南為基地，包括一九〇七年的防城之役及同年的鎮南關之役，一九〇八年的欽、廉之役與同年的河口之役；而香港與新加坡則為這些起義行動的後動中心。此外，純粹由南洋華僑供給大部分人力、財力而發動的革命起義，則有一九〇七年的潮州黃岡之役與同年的惠州七女湖之役，而一九一一年的廣州三二九之役（即所謂「黃花崗之役」），其大部分的財務支出，亦均係捐自南洋地區（註二）。

所以，南洋在清季反滿革命史上的地位，主要係在於兩方面：第一，自一九〇八年之後，它已成為孫中山反滿革命行動的指揮中心；第二，它在此之前與在此期間，不只成為革命黨人的一個聚集與通逃之所，也為反滿革命行動提供了大量人力、財力與物力的支援。人力方面的支援，由於現有資料的不全，我們現在已經很難作確切的統計說明，但我們確知潮州黃岡之役與惠州七女湖之役的部分領導人物，為返國的華僑無疑，而起義失敗後未被捕的部分革命志士則自香港遠逃南洋各地居留（註三）。就財力的支援而言，據孫中山先生自稱，在其自一九〇七年五月至一九〇八年四月的一年期間所發動的三次武裝起義中，他所籌募的支援款項，共計約為港幣二十萬元，其中約有一半，為籌募自南洋華人社會，包括新、馬地區的港幣一萬元，荷印地區的港幣三萬元與越南、暹羅地區的港幣五萬元等（註四）。不過，根據顧清遠博士

的研究，孫中山先生所提供的此一數字，可能只是他本人經手的款項總數，而在南洋各地分由其他革命領袖如胡漢民、汪精衛等所募集的款項，則似乎並未包括在內（註五）。此外，兩次潮州黃岡起義所支付的約五萬元叻幣當中，其中約三萬元為捐自新加坡華人，其餘則來自私人途徑，只寓居新加坡的潮籍革命黨人林受之即兩次獨捐叻幣二萬元之多（註六）。新、馬華人對一九〇七年惠州七女湖之役所捐獻的款數，雖無資料留存，但我們確實知道，為支助此後所發行的革命軍債券曾在馬來亞的吉隆坡與吡叻州華人社會內發售，可見其財力的來源，必有新、馬華人之一份。現有資料顯示，在一九〇七年的欽廉之役、同年十二月的鎮南關之役與次年（一九〇八）四月的河口之役等三次武裝起義中，新、馬地區的捐款雖然只有叻幣五千九百元的較少數目，但這很可能主要係因當地華人社團在前幾次的捐獻起義經費時，支出的數目過大，無力續舉的緣故（註七）。

一九一一年廣州三二九之役為一次準備最為周全而最為孫中山先生所重視的起義行動，集革命志士之精英，作奮力之一擊，所募得的款項計達叻幣（或港幣）十八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元，其中自南洋地區所募得的，則共為十一萬零六百三十六元（其中包括募自新、馬的四萬七千六百六十三元，荷屬東印的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法屬印支與暹羅的三萬零四百二十三元），占總數額的百分之五十八點九（註八）。同年所發動的武昌起義（西曆十月十日）雖為同盟會中部總部所主持，與南洋華人的關係較少，但在其發動之前，當時已遷至檳城的同盟會南洋總支部應黃興之請，即曾寄出叻幣數千元至上海民立報轉交黃氏，以為其赴鄂、川聯絡黨人之用；而黃氏此行對於武昌起義的發動，很有促進之功（註九）。另外，在武昌起義之後，革命軍在清軍大舉進攻堅持戰鬥期間，所獲新、馬華人在財力上的支援更多，只現有資料可以查明

的，即達叻幣（或港幣）八十七萬零九百元之巨；其中匯寄香港革命黨籌款局者，為二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四元，寄孫中山先生本人者有五萬元，直接匯寄上海者，有六萬六千五百六十二元，寄福州閩省革命軍政府者，有二十七萬元，寄廣州廣東革命軍政府者，有二十五萬元（註一〇）。

這些都是比較完整的財力捐獻的數字，其他長期性而比較瑣碎的財務捐獻，根據不完整的統計，只新加坡一埠，華人士士所作的各項捐獻，即極為可觀。茲列表於後（註一一）：

事 項	時 間	主要人物	籌 捐 款 項
1. 設立星洲書報社宣傳革命	一九〇二年	鄭聘廷	不詳
2. 「蘇報」案後，翻印「革命軍」一書五千冊，更名「圖存篇」運入中國宣傳	一九〇三年	林義順	不詳
3. 創辦「圖南日報」宣傳革命	一九〇四年 初至一九〇 五年底	陳楚楠 張永福	五萬元
4. 孫中山日本遊學紀念，翻印「革命軍」，每冊印三百四十元，二千冊共九十元	一九〇六年 十月十六日	張永福	不詳

5. 黃岡（潮州）起義後，在香港百餘未被捕之志士，聞風逃避，由馮自由介紹先後到新加坡及暹羅躲避	一九〇七年五月後	同盟會分會志士	不詳
6. 創辦中興日報	一九〇七年八月至一九一一年七月	陳楚楠 張永福 林義順 許子麟	共一千九百六十七元（張永福、陳楚楠各出四百元）
7. 孫中山自日本函陳楚楠詢籌款事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廿二日	陳楚楠	不詳
8. 同盟會分會之費用由會員分擔，另外支部經費則由所在地方之工會捐助	極可能係在分會成立後幾定的	同盟會分會會員	不詳
9. 孫中山自三內返粵後，在加坡籌款，謂前所得三千元不敷用，望能更多	一九一一年八月廿三日	張永福	超過三千元

10. 丁未七月廿八日在清河宅開會，捐款營教余既成訟費，越數天，由張永福湊足電滙一千八十元，交香港馮自由支用	一九〇七年 黃岡起義之後	張永福、陳楚楠、陳吾從、陳貞祥、許子麟、林義順、何虞頌、陳開國、陳武烈、蕭百川、陳華丹、蔣玉田、黃耀廷、陳子泰、趙全鼎	張永福、陳楚楠各出四百元，陳吾從出二百元，陳貞祥、許子麟各出一百元，林義順、何虞頌各出五十元，陳開國出廿五元，陳武烈、蕭百川各出二十元，陳華丹、蔣玉田各出二十元，黃耀廷、陳子泰各出十元，趙全鼎出二元
11. 鎮南關之役失敗，退下志士一百餘人，由胡漢民辦好交涉，送來新加坡	一九〇七年 十二月以後	同盟會分會 志士	不詳
12. 雲南河口之役失敗，胡漢民又第二次派四百餘人往新加	一九〇八年 五月之後	林義順、沈聯芳、林饒	不詳（此等志士抵達，即以每人二百元保出，共以製業價八

13. 河口撤二百餘人來新加坡	一九〇八年 六月以後	張永福等	萬元爲擔保金） 以契業值五萬元爲擔保品， 每日供白米千斤
14. 開闢中興石山於蔡厝港，以 安插從河內撤來之革命志士	一九〇八年 六月以後	張永福、陳 楚楠、林義 順	不詳
15. 創辦「陽明報」	一九〇八年 十月十四日	鄭提摩太	不詳
16. 創辦「星洲農報」	一九一〇年 七月至一九 一一年底	謝心準、周 之貞	不詳
17. 創辦「南僑日報」	一九一一年 四月廿七日 至革命成功 之後	盧耀堂、黃 吉辰	不詳

18. 設立開明演說閱報社	一九〇八年	何心田、胡兆麟	不詳
19. 設立同德書報社	一九一一年初	趙鈞溪、鄭子輝	不詳
20. 汪精衛在北京謀炸清攝政王載灃不成，被捕，橫坡及新加坡黨人出資營救	一九一〇年四月十六日	吳世榮、黃金慶、陳武烈、林義順	數千元

在思想戰線上，南洋華人所做的貢獻，亦甚宏偉。如上表所示，新加坡反滿革命志士陳楚楠、張永福早在一九〇四年初，即創辦「圖南日報」，作為與康有為、梁啟超保皇黨思想論戰及宣傳革命的據點；初期曾發行過一萬份，後減至每日一千份，但長期的訂閱者則只有三十餘份，所以銷路一直是入不敷出（註一二）。後來為擴展銷路，曾想出一些新辦法，如贈送日曆、禮券及舉辦文藝作品比賽等；其於一九〇五年附贈的日曆牌上印有石達開原撰的對聯：「忍令上國衣冠淪於禽獸，相率中原豪傑還我山河」；另外，也印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及「圖開新局勢，書檄佈東南」等字樣，另附有「自由鐘」、「獨立旗」等插圖，以鼓吹革命（註一三）。但該報的銷路一直不好，掙扎了近兩年，最後終於停刊了。（註一四）。

一九〇六年初，陳楚楠、張永福二氏又另創辦南洋總匯報，以繼續鼓吹反滿革命；但因該報內部因應

否宜揚革命而發生爭執，陳、張被迫退出，而由保皇黨分子接管該報，改原名爲總匯新報，此後竟一直成爲康、梁維新派在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喉舌報刊（註一五）。革命派人士至一九〇七年後始在孫中山先生的親自策劃下，創辦中興日報，以與對抗。中興日報的經費，大部分係孫中山自香港方面募來的，主持人與撰稿人也包括了同盟會革命黨人的精英，如胡漢民、汪精衛、居正、田桐等，甚至孫中山先生本人也「曾以『南洋小學生』的筆名，數次寫稿在該報刊出（註一六）。該報在政治立場與言論上與保皇黨人所控誦的總匯新報自初即針鋒相對，就『革命與君主立憲』、『革命會否引起各國干涉』及『請願國會無意義』等一連串問題，進行一連串的筆戰（註一七）。對於啓導和敦育南洋華人對於反滿問題的認識，厥功甚偉。可惜它的經營情況不善，營業的收入一直不能維持開銷，終於在連續出版兩年半之後的一九一〇年停刊（註一八）。

與創刊中興日報的同時及該報停刊之後，新加坡反滿志士並曾另外創刊陽明報、星洲晨報及南僑報等以宣揚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建國理想；惟因經費不足，各報都只能維持一年或一年以下的短時期的發行，即告相繼停刊。但它們作爲革命黨與南洋華人互通訊息和橋樑的作用，仍是深具意義與影響的。

除在發行報紙外，反滿革命志士爲宣揚革命思想於社會，使更多人能夠閱讀到各地所刊印的反滿革命書刊，也在南洋各地，特別是新加坡、馬來亞地區，設立了許多「書報社」，免費供應有興趣的讀者前來閱讀，以擴大這些書刊的影響力量。顏清煌曾將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四年之間革命黨人所設立的書報社，予以統計，單只在新、馬兩區者即達五十八家，一九〇八年以前所設立的，及南洋其他各地者，尚未統計在內。茲列表於下，以見其分佈的一般趨勢（註一九）：

書報社名稱	所在地	負責人
公益	新加坡	胡伯驥、何德如
同德	新加坡	張永福
同文	新加坡	黃義華
公民	柔佛州	郭信(?)
益群	柔佛州 Batu Pahat	王及時
啓智	柔佛州 藤坡	劉靜山
中華	麻六甲	鄧澤如、李月池
六條石 (Batu Anam)	森美蘭州 六條石	朱亦寬
自進	森美蘭州 武來岸 (Broga)	—
美蓉	森美蘭州 美蓉	黃心持
華商	森美蘭州 文丁 (Mantin)	柯武炎
華商	森美蘭州 知知 (Titi)	李漢生
士莪月 (Semenyih)	雪蘭莪州 士莪月	李漢衡
中華青年益賽會	雪蘭莪州 巴生 (Klang)	林梅端
中華	雪蘭莪州 巴生	譚長進
華商公所	雪蘭莪州 巴生	李金泉
育智	雪蘭莪州 萬撓	—

加隆邦 (Kalunor pang)	雪蘭莪州加隆邦	張碧天
介文	雪蘭莪州吉隆坡	陳占梅、阮德三
開明演說書報社	雪蘭莪州甲洞 (Kerong)	—
暗邦 (Am pang)	雪蘭莪州暗邦	李耀南
啓明	雪蘭莪州 (Kachau)	戴水
文華	雪蘭莪州加影 (Kajang)	古仲熙
群智	雪蘭莪州巴生	陳堯階
中國青年益賽會	雪蘭莪州吉隆坡	彭澤民
公益書報社	雪蘭莪州 Rasa	黃長成 (?)
光漢	雪蘭莪州 Sungei Besi	孫林
覺民	吡叻州 Sungei Pulan	李竹溪
培智	吡叻州安順 (Telok Anson)	黃少行
興華	吡叻州 T. Ronoh	陳炳初
益智	吡叻州 Pusing	吳順安
萃群	吡叻州美羅 (Bidar)	黃星如
華僑	吡叻州怡保	李孝章
培文	吡叻州沙叻 (Salak)	陳芸生
興華	吡叻州 Lahat	梁陳英

民興	吡叻州 Mengluibu	陳雲生
開智	吡叻州金保 (Kampar)	李田秀
詩佛文墨	吡叻州安溪 (Sungkai)	簡世彬
益智	吡叻州實里遠 (Sitiawan)	陳克朗
同德	吡叻州	謝八堯
觀明	吡叻州 Kubu	吳鼎渠
高淵	吡叻州高淵 (Krian)	——
達材	吡叻州紅毛丹 (Tg. Rambutan)	劉維秋
啓智	吡叻州朱毛 (Chemor)	陳克薩
益群	吡叻州打巴 (Tapah)	林金福
南華	吡叻州 Batu Kurau	夏陸儒 (?)
中國青年益賽會	吡叻州金保 (Kampar)	張志昇
太平	吡叻州太平	陸文輝
進步	吡叻州布來 (Pulai)	王月洲
圖南	吡叻州 Bagan Tjong	楊麟川
益智	檳城 (Penang)	李漢生
華僑	威士力省大山脚 (Bukit Mentajan)	林世安
新漢	吉打州雙溪大年 (S. Patani)	宋伯聯

文冬	彭亨州文冬 (Bentong)	鄧少民
光漢	彭亨州北干 (Pekan)	方少峯
斯文	彭亨州淡馬魯 (Temarloh)	—
中華	彭亨州關丹 (Kuantan)	—
四民	彭亨州林夢 (Limbang)	—

此外，反滿革命黨人也在設立學校方面，與保皇黨人處於競爭的地位。不過，他們一時並未能控制保皇黨人士所設立於新加坡、檳城、吉隆坡等地已有相當規模與基礎的一些華校，只能集中力量設立一些夜校及著手控制一些鄉區及小城市裡的華校。如在一九〇八年八月之前，新加坡即有大部分為同盟會人士所控制的夜校三所；另在吡叻州怡保郊區的鯉生學塾、彭亨州勞勿 (Raub) 的中華學堂與吉隆坡的杜南學堂，一般上均為革命派人士所控制（註二〇）。如在勞勿中華學堂就讀的卅二名學生中，有廿一名即擁有反滿性質的名字，如王漢豪、鄭漢興、鄭擊清、李秉滿、黃羅胡等。一九〇九年年底，該校學生十三人並集體剪去辮子，以表示反滿的決心（註二一）。杜南學堂的學生曾在吉隆坡禁烟公所所舉辦的戲劇公演中，公開合唱革命性質的愛國歌曲與團結歌曲（註二二），怡保鯉生學塾則將每年三月十九日明末崇禎皇帝殉難之日列為學校假期，全校集合予以紀念（註二三）。

以下我們再就南洋華人在辛亥革命前在反滿革命思想方面與香港的交流，予以簡略的敘述。在這方面的交流，此期主要尚是單方面的，以香港為輸出者，其所發生的作用，首在啓迪南洋華人社會的反滿意識，其次則在反滿思想與行動上藉文化交流的方式，予以進一步的灌輸與影響。就前者而言，如在興中會成

立前即與孫中山高談反滿革命無所顧忌的所謂「四大寇」之一的尤列，即於一九〇一年初南下新加坡旅居，對南洋華人反滿思想的流佈，具有相當大的啓蒙作用。尤氏雖為廣東順德人，但多年寓居香港，亦可稱之為香港人，而向與廣東各地的秘密會黨具有密切的聯繫，初期革命黨人與會黨的聯繫，他為最主要的人物之一。至一九〇〇年惠州之役的武裝起義失敗後，才逃亡海外，先赴日本橫濱，後始前往新加坡，在該埠廣東人聚居的牛車水區開設「一葉樓」診所，自稱「一葉樓主」，懸壺濟世（註二四）。謀食之餘，尤氏即常與當地下層社會階層的各色人等相接觸，並繼續其原在橫濱所組織的反滿的「中和堂」，成立當地的「中和堂」分部，灌輸黨友以反滿革命的思想（註二五）。該堂在組織上與孫中山的「興中會」，並無關係，但在反滿的目標上則為一致，兩者之間的關係，實建立在尤列本人與孫中山先生的個人連繫上；但該堂組織的發展，相當迅速，很快即在馬來亞的幾個主要城市如吉隆坡、檳城、怡保、芙蓉等處設立分會（註二六）。尤列又藉推廣華人業餘教育的名義，在牛車水等地公開講授四書，不收任何費用；另又在怡保設立教育會，提倡業餘教育（註二七）。新加坡當地早期的兩位反滿革命領袖陳楚楠與張永福，原係薛心保皇維新、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的人，其思想上之轉變為反滿革命，即與尤列有關。在尤氏的影響下，陳、張二氏並於一九〇四年投資五萬元創辦南洋第一家宣傳反滿的報紙圖南日報，其內容很受到孫中山的激賞。尤氏並介紹香港中國日報的資深記者陳詩仲擔任圖南日報的主編（註二八）。

此外，一九〇八年底香港振天聲數團之南訪新、馬與南洋各地，深入民間，演唱反滿革命性的戲劇，也是灌輸反滿思想的盛事，對於新、馬華人社會思想的趨向，普及反滿思想於一般下層社會的華人，很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當時香港反清人士成立了幾個劇團，公演一些新編成的革命戲劇，以為社會教育的一

部分，而振天聲劇團即為這一類反滿性質的劇團之一。該劇團應新、馬華人社會之邀，於一九〇七年南來訪問，作各地巡迴式的公演；所演徐錫麟一劇，描述具有革命思想的徐錫麟在安徽省城安慶刺殺皖撫端人恩銘，而後不幸被俘，慷慨就義的一幕。由於該事件剛剛發生（一九〇七年西曆七月六日），而徐氏又身居地方政府的高位而能犧牲個人，所以極能激動人心，引起觀眾的共鳴。當該劇團抵達新加坡時，適孫中山亦旅居該埠，劇團中的許多非同盟會團員即因受到孫氏本人的鼓勵而加入同盟會（註二九）。

該劇團在新加坡公演完畢後，即北上馬來亞半島西部各主要城市如芙蓉、吉隆坡、巴生、怡保、太平、檳城演出；雖然在有些地方曾受到當地保皇黨的一些阻撓，但一般上都非常成功，吸引的觀眾很多，而很多觀眾都因受到這些反滿戲劇的影響，改變了他們原先對反滿革命的一些誤解，對此後華人社會內反滿革命宣揚的推動，甚為有利（註三〇）。此後，新、馬華人社會內某些社團也因此仿效組織了一些本身的劇團如汎愛班劇團、民鋒社劇團等，其所公演的一些帶有反滿革命意識的許多戲劇如「徐錫麟」、「熊飛將軍戰死六華塔」、「秋瑾之死」、「鐵路風潮」、「博浪沙進擊秦始皇」、「醒夢鐘聲」、「烟鬼之妻」、「敗家子」、「文明鏡」、「烟鬼過年」、「迷信慘劇」、「毒中毒」、「幸運賊」等，都頗流行一時，而其中的很多戲劇，都可能源自香港而傳來（註三一）。所以，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一年擔任同盟會新加坡分會主席的張永福，即認為這些反滿性質的劇團演員對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實有相當大的貢獻（註三二），他們對於啓迪南洋華人社會較下層人士之傾向於同情或支持反滿革命，其功勞是不可沒沒的。

附 註

註一：溫梓川，「孫中山先生在檳城」，南洋文摘，七卷二期，頁九六～九七；Wang Gungwn,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 (南洋學報) Vol. XV, Part 2 (Dec. 1958), pp. 304-305.

註二：黃福鑾，華僑與中國革命（香港，民國四十三年），頁五七～六一、二〇六～二〇七；另參閱拙撰「南洋方面研究孫中山先生的史料與史學」，研究孫中山先生的史料與史學（臺北，民國六十四年），頁二九一。

註三：Wang Gungwn, *op. cit.*, pp. 304-305.

註四：國父全書（臺北），「致吳敬恆書」（一九〇九年），頁四一九。

註五：Yen Ching-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09-310.

註六：Ibid., p. 36.

註七：Ibid., pp. 310-311.

註八：Ibid., p. 311.

註九：楊漢理編，懷遠堂書報社廿四週年紀念特刊（檳城，不著出版年），頁六一～六二。

註一〇：Yen Ching-hwang, *op. cit.*, pp. 313-314.

註一一：歐陽昌大，「新加坡華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見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一九七二年），頁一〇一～一〇二。惟該表內所列之籌募準備廣州三二九之役（一九一一年）所捐款數目與武昌起義後所捐募的各筆大額款項，因與本節前文所述相重複，故未列入。

註一二：Yen Ching-hwang,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906-1911", *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 (南洋學報), Vol. 29, Parts 1 and 2 (Dec.